

# 為何而研究？ 社會工作科學典範與研究倫理

許雅惠

## 壹、變遷中的社會工作樣貌

從慈善到專業，社會工作走了近百年。發展初期為了追求能與其他社會科學並駕齊驅，能獲得社會認同，社會工作曾傾向以個人取向的角度詮釋個案遭遇的問題，運用心理分析和治療的技術來幫助個人與家庭，以追求較好的職業地位和待遇。相對的，貧窮議題、族群歧視、弱勢處境者遭遇不正義等結構性因果，較少被關注。二戰後從歐洲傳入北美的批判理論思想，掀起了年輕菁英投入民權、婦權、反戰等社會改革浪潮。許多新的社會文化理論不約而同地指責強調個人主義與自由競爭的價值導向，呼籲應更關注結構性限制對個人問題的影響。1970年代後，批判理論、生態系統觀點、女性主義、充權與反壓迫實務等理論逐漸成熟，許多學者指出社會工作如何成為社會控制工具，如何協助當權者規訓弱勢處境者；並試著將

社會工作專業導正回對結構具轉型正義、具社會改革效果的路徑。例如，Bailey與Brake（1975）的基進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Germain（1973）提出個案工作實務的生態系統觀點，為社工理論注入活泉。

然而，為何我們還是看到較多的問題解決、短期焦點、行為修正等技術運用在社會工作實務中，較少看到意識覺醒、結構改革、社區行動等方法？作者認為，理論與實務之間為何會產生落差？除了福利政策的意識形態外，這個落差有一部分也來自於研究行動和其科學典範（paradigm，或譯為派典）定位。

研究是獲得社會知識主要的來源，社會工作在專求專業化的過程中，不斷地被期待（或要求），應於專業決策中提出具有證據力的解釋或佐證，於工作中展現研究意識（research-mindedness）（Humphries, 2008）。研究也一直是社會工作證明其專

業的重要方法。2011年，John Brekke在美國社會工作與研究年會中、Perter Summerfield在第一屆歐洲社會工作研究會議中，不約而同地談論到社會工作的科學危機。Longhofer與Floersch（2012，2014）後續則以社會工作的「危機」來稱呼此一「現象學式的實務落差」（theory-to-practice gaps, phenomenological practice gaps）。其指出這個實務落差將造成社會工作本質受到傷害的危機：當追求因果律則驗證的實證主義，與基進主義強調價值與道德重要性，彼此各說各話時，社會工作如何被認可為有責信的專業？社會工作是甚麼？應如何展現科學性或有效性？

長久以來，社會工作被認為缺乏一致性的認識論基礎，在理論和技巧上沒有系統性結構，在理論與實務間有很大的落差（Bamford, 2015; Göppner & Hämäläinen, 2007; Salisbury Forum Group, 2011; Soydan, 1999; Wiley, 2012；引自Hothershall, 2018）。主因在於，從歷史起源和社會工作的價值面上，社會工作從來不是那麼地「科學」，也不應該那麼地「科學」。如果社會工作過度依賴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知識來源、強調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要求，自然會在不同典範中出現明顯的矛盾（Melnyk & Newhouse, 2014; Sheldon & Macdonald, 1999; 引自Hothershall, 2018）。

Fischer（1973）曾以〈個案工作有效

嗎？〉（Is casework effective? A review）一文指稱，約50%的個案在經歷社工處遇後情況變得更糟，並呼籲應加強運用「客觀的工具」來強化科學化的實務性評估。因此研究法與社會統計課程，迄今仍為各校社工教育、國家專業考試中的必修學科。爾後，在新自由主義績效要求下，「以證據為基礎的」（evidence-based practice, EBP）實務，更成為美國社會工作研究的主流。專業人員協會將執行研究納入倫理守則，不斷提醒社工實務者應該多閱讀、多運用理論、多執行研究、多操作具有證據支持（evidence informed）的實務（Forte, 2014; Roberts et al., 2006; Sackett et al., 1996）。

換言之，當主流科學典範是實證主義，證據指的是「問卷、測量和統計數據」之際，其他非主流典範將難以在知識產製上與其競爭。許多社會工作理論應用因未能在實務操作上被量化評估、發表，將因此無法得到足夠的資源和經費支持，進而被學習或複製。實務工作者的主要目標是取得資源提供服務；但取得資源需要證明績效、展現成果等評估性研究；評估性研究如何取信於經費提供者（政府或社會大眾）？這些都取決於何謂「科學」、可信的證據？這類名為「證據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vidence）上的爭議（Humphries, 2008），在不同研究典範中也有深入的辯論。另一方面，當量化績效

成為主流科學觀點並壟斷了出版與補助的機制，學術與實務工作者將因缺乏足夠資源來進行探索性、實驗性、或長期性的研究；實務研究傾向於以輕薄短小、短期內的方案評估，這類型知識產出將不足以讓典範產生轉移。

從理論和實務的落差到科學危機，核心議題不外乎是社會工作研究該呈現何種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甚至是價值論？社會工作社群是否該有一致性的共識？社工專業還能以主流的實證主義為宗嗎？

## 貳、是科學、還是藝術？社會工作研究的本體論與認識論

「社會工作既是科學，又是藝術」；這大概是多數社工學生最朗朗上口的專業定義；也是作者30多年前初學社會工作概論時的教科書金句。然而，當年作者所學習到的社工研究法，教學內涵都是線性的研究邏輯思考，歸納整理文獻、發展研究假設、設計問卷、進行調查、驗證研究假設、寫出結論與建議；教科書與教學內容就是社會調查法和社會心理學統計，幾乎未曾探討科學典範間的爭議。

時至今日，歐美仍以實證主義為宗，但臺灣的社會工作科學活動樣貌如何？此問題相當複雜，因為它涉及到學術界、實務界、教育界等多方面的科學活動，本文

難以在此驟下論斷。但以作者觀察到的研究法教學來看，雖然教科書裡已經增加部分的質化研究方法，但教學上仍以量化邏輯取向為主，從文獻檢閱中歸納出研究假設，進行問卷設計與測量，進行信效度分析、統計檢定、假設驗證等線性邏輯仍是主流；社會統計課程成仍是各系所必修課程。另一方面，作者卻也不時聽到實務工作者質疑修讀研究方法與統計之必要性？實務工作上又用不到？都還給老師了？國家考試為何要考統計？等聲音。雖然許多國家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都強調，消費（閱讀）研究與生產研究是社工員的倫理義務，但當前臺灣的社工界仍明顯存於研究與實務之間的落差，有些社會工作者認為做研究是學術界的事情，非實務工作者之日常或必要（張英陣，2006）。德國近期也仍有類似情況（James et al., 2018）。缺乏研究企圖與技術的實務現場中，就只能以藝術者自詡，幾乎無法參與學科典範之討論。如此看來，臺灣的社會工作一直無法取得令人滿意的專業地位，或許也與專業知識與典範矛盾有關。

知名的教育學者Guba與Lincoln於1980年初開始提倡自然探究方法學，並將質性評估方法提升到典範層次，持續提出新典範、深化不同典範間的比較、爭議、矛盾等（Guba, 1990; Guba & Lincoln, 1981; 1982; 1989; 1994; Guba, Lincoln & Lynham, 2017; Lincoln et al., 2011; Lincoln & Guba,

2000)。Guba與Lincoln（1994）最初以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批判主義（包含女性主義與種族觀點）、建構主義為四大典範；爾後又增加參與式典範（含後現代觀點），總結五大典範（Lincoln & Guba, 2000）。2011、2017年的新版本，則針對方法論的議題與內涵提出更多深入討論（Guba et al., 2017; Lincoln et al., 2011）。1994年後的修訂版本解釋內容較少，為便利實務者與學生閱讀，作者此次將前後版本增刪內文進行整合，形成表1與表2。惟限於篇幅與本文主旨，無法再輔以文字說明，請讀者自行閱讀表格內文。

一個完整的科學典範，至少涵蓋三層次，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方法論（methodology）；隨著對科學哲學辯證日深，開始出現第四個層次的討論，價值論（Axiology）（Guba & Lincoln, 1994; Reason, 1993; Richardson, 1994; 引自Lincoln et al., 2011, p. 116）。目前教育學和社會學研究已擁有容納多元典範的空間，惟臺灣的社會工作學界似乎較少運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等概念架構，來檢視專業社群的研究活動。至於社會工作應以何為典範？作者認為，應留

表1 比較五種研究典範之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本體論	索樸實在論：實體是真實的，且可透過實證方法被捕捉到	批判實在論：實體是真實的，可被捕捉，但可能不完全或被充分理解	歷史實在論：實體是由社會、政治、文化、經濟、族群、性別等各種價值所形塑的，甚至是在權力衝突下經歷過特權或壓迫的關係；乍看為真的實體，可能是虛幻的假象；真實應透過歷史辯證結晶化而得	相對主義：實體是由局部性、特定位置的、經驗性的、多元化的心理結構和詮釋所建構而成。	參與式真實：客觀—主觀合一的真實，且是由集體心智和周遭環境所共構而成。透過理解自我和他人的關係而非拘泥於主客關係連結中，理解研究客體並將其從不對等的主客關係中解放出來。真實是建立在參與式行動之中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認識論	二元論／客觀主義者；以發現真理為任務。不必要和研究客體產生互動，研究者只需要關注科學程序的嚴謹度，不需考慮對社會或研究對象的影響。	修正的二元論／客觀主義者；假設真實者；可能部分被認識，統計資料可能是不完整的。與研究對象的互動應保持最低限度；研究的效度建立應來自於研究同僚，非研究對象。	交互的（transactional）／主觀主義者；研究發現是帶有價值介入的。研究應從社會結構、自由與壓迫、權力與控制等面向來啟動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透過互動與連結，透過研究創造知識，這些知識將可以改變現存的壓迫結構，並解放被壓迫者，使令被充權。	交互的（transactional）／主觀主義者；研究發現是合作而得的。人們在其認知參考架構下建構其真實，而研究者在雙方的互動情境下創造出意義。研究者應深刻反思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了解自己與他人之間互為主體的過程；理解自己是誰、理解自己如何認知世界、活生生的日常經驗等，這些都必然會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知識生產互動中浮現。	要認識事物的全形（holistic）必須透過親自參與其中；唯有在親身的參與經驗與周遭環境產生交互作用中，生產出帶有批判性質的主觀性知識。認識的方法可以從經驗性認識（experiential knowing），一直延伸到表達性認識（presentational knowing）、命題性認識（propositional knowing）、實作性認識（practical knowing）。知識因此是共同創造出來的發現；合作的關係必須透過參與，且同時包含認識論層次和政治行動層次的共同參與才算完整。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方法論	實驗設計／操控的；驗證研究假設；主要以量化方法為主。相信否認原則、可以被重複操作的設計和方法才是硬（hard）科學。	修正的實驗設計／操控的；批判的多元主義；相信否認原則，但也能運用質性研究方法。除了相信應用統計技術等硬科學外，也試圖提出更多疑問來發現未知的新變項、創造新知識。仍須盡量保持客觀性，運用假設、推論、概推等方法來趨近真實。	對話的／辯證的。運用參與式研究，來充權被壓迫的族群，並支持社會轉型或革新。	詮釋性的／辯證的。透過對語言結構、隱喻的肯認和解釋，持續進行理性的辯證以詮釋、比較差異觀點，形成具對比性的辯證。而真實的就存在於某種彼此產生共識的語言形式中。可用的方法包含訪談、觀察、既存文本的分析。真實是合作共創的，在研究者與互動者充份的對話下，意義將於過程中自然而生。	在合作的、行動式研究中實踐積極政治性參與；以實作性知識之獲得為首要任務，並使用根植於共享經驗脈絡中的語言。亦應關注如何解構語言或論述，特別是挑戰看似主流的論述，是否可能只是虛假的再現（如：二元化的概念——甚麼是好？正常？正確？）。經驗性的認識，是透過面對面的互動，並從實地操作中來獲得新知識。所以參與者應從共識和方法面上建立民主性的對話，在平等的合作關係相互連結。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價值論	研究本身的目標，就是追求對世界的命題式認識（propositional knowing），研究者應該和研究對象保持距離，不應影響人們的行為。這是做研究最本質性的價值。		研究者用研究來改變教育、社會組織的政策和實務；目標是促進社會正義和社會解放，特別是弱勢者和被壓迫者。以此態度做研究，才是最本質性的價值所在。	命題性、交互性（transactional knowing）的認識方式，是具有工具性價值的方法。同樣具解放性目的，但相對於批判觀點追求立即改革效果，建構主義更期待對話者能獲得反思能力與智識上的消化能力。	操作性的認識（practical knowing），是研究的最本質性價值；如何在自主、合作、文化階層中取得平衡，並獲致豐盛的成果，就是核心的價值所在。透過強化人們彼此間的連結、參與、使與他人共同做決定等，是社會運作、使人類更繁榮的必要方式。

資料來源：作者摘錄、綜合整理自Lincoln等人（2011, pp. 98-105, 111-112）。

給整個社群來共同討論。但前提是，應先了解典範間的哲學性差異。

本體論的核心探究是，甚麼是社會實體的真實本質？研究者於探究新知識的過程中，對社會實體抱持何種假設和觀點？認識論關心的是研究者的思考過程，試圖釐清知識與人的互動，個人所見（see）與所知（know）之間的關係；作為一個研究者，必須要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所信仰的真理為何；延伸下去，則會影響到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關係。方法論涵

括研究探問新知識的一切過程，研究操作方法、技術、原則，與如何達成目標等議題。因此從研究目標到成果發表，幾乎都屬於方法論層次的議題（Lincoln et al., 2011, pp. 102-105）。價值論，直指研究者的立場與姿態；研究者在其研究中採取何種價值立場？如何行動？特別是有關倫理原則上的價值判斷？價值（value）這個概念，在研究者心中代表甚麼（Lincoln et al., 2011, p. 111）？

社會工作服務對象是「人」，強調

「人在情境中」(person in environment)，而人所處環境是持續變遷的。因人與環境之多樣性的，其研究行動和理論觀點也必然是複雜多元觀點。因此，社會工作研究法教學，不能只聚焦於方法論層次的技術與原則；更應該引導學生探究反思，社會工作本體論與認識論為何？「社會工作是甚麼？」「社會工作應服膺於哪種典範？」「社會工作者應抱持甚麼樣的世界觀？」「社會工作者相信哪種社會真實？」認識論層次則是對「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間應維持甚麼樣的關係？」「組織與國家的關係是甚麼？」這些問題提出回應。當教學者要引導學生思考這些問題時，恐怕就無法只以「社會工作既是科學，也是藝術」一語帶過。英國學者 Aymer 與 Okitikpi (2000) 指出，當他們試圖在社工教育中帶入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哲學教育時，雖有認同者，但最常被提問的問題還是，「這跟社會工作（學生、實務者及其日常工作任務和責任）有甚麼關係？」。這樣的疑問顯示出大家對於社會工作知識的本質、哲學基礎或其各種活動，並沒有真正的共識。而實務與理論落差在臺灣，從張英陣 (2006) 為文至今，快20年了，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是更有共識？或更分歧？最新的研究顯示，與實務者合作、實務者與服務對象合作，以參與式典範的精神，平等民主的合作關係，達成實踐、解放、賦權的目標，

仍有很多困難有待突破 (Andersen, 2019; Serbati et al., 2019)。

Gibbs (2001) 爬梳了自1970年代後，影響社會工作科學的兩大認識論傳統：實證主義 (positivism, scientific empiricism) 以及啟發主義 (heurism, naturalistic inquiry)。前者主導了北美的社會工作學科知識生產；後者則主要是英國的社會工作認識論取向。實證主義對知識的看法，主張研究目標在於追求對社會問題的因果解釋，透過可觀察的實體現象、單案研究、實驗設計、隨機控制 (RCTs) 等方法，歸納出有效的問題解決路徑、預測能力、發展工具來測量不同社會工作干預的進展與有效程度 (Belchamber, 1997; Peile & McCount, 1997; Reid, 1994；引自Gibbs, 2001)。而詮釋主義認識論，則認為社會實體 (social reality) 是複雜的、無法控制與預測的，知識生產很難掌握普同性的真實，而應致力於呈現具有脈絡性的相互理解。研究者的立場與角色至關重要——不同於實證主義一味地要求保持客觀中立——詮釋觀點的研究更期待研究者、資料蒐集過程，更仔細地審視環境、社會、政治、或文化脈絡等因素，如何影響人們認知他們的問題與處境。換言之，研究對象表達出來的聲音、話語、對問題的詮釋、甚至是價值判斷，都比統計數據更具有真實效度。方法上，深度訪談、敘說分析、



現象學、甚至民族誌方法，可以讓人們從中自我學習，讓問題的多面向意義被呈現（Ruckdeschel, 1985; Sherman & Reid, 1994；引自Gibbs, 2001）。

但這兩大傳統典範，也被其他批判性典範所挑戰；女性主義、基進主義、後現代主義與相對／原生觀點（relativist positions and indigenous research）這四個批判性典範，也陸續在社會工作的科學典範論戰中，分別提出他們對社會工作知識生產的期待。主要的批判理由是上述兩大知識論，在問題邏輯上都還是太個別化的假設，最終導致，社會工作服務干預大量地走向認知行為理論與模式。因為短期的處遇介入，最容易評估出來的成效證據就是認知——行為的變化；但這真是社會工作的專業使命和目標嗎？與諮商、心理治療有何不同？

在新自由主義、福利私有化、管理主義的影響下，英國在1990年後提倡「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透過各種研究計畫的獎補助機制、對學位論文的品質檢視、全國性職業標準中納入對學位和學位後訓練指標、要求社會照顧機構必須開創有用的、相關性高的知識以追求卓越等作為，讓新管理主義的精神滲透進入學校教育與實務研究中（Humphries, 2008）。特別是當政府或組織管理階層急於知道「服務績效」之際，自然就會引導大家把研究的心思放到目標、成本、預算、行為改變、資

源投入、程序標準化（SOP）等實務議題上。這些研究或評估或許有其價值，但是當新管理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後，研究資源大量地傾斜或被壟斷；在英國（Clarke et al., 1994; Pinkney, 1998）、紐西蘭（O'Brien, 1999；引自Gibbs, 2001）都是如此。

Lowndes（1997；引自Gibbs, 2001）也指出，**新體制**（如：社區照顧，從大機構到小社區多元服務提供者的破碎化）、**新關係**（管理者vs.一線工作者；工作者vs.個案；職工vs.利害關係人，如捐款者、補助單位、合作夥伴和倡議團體）、**新語言**（從個案變成消費者；加害人變成服務使用者），最後產生**新哲學**（追求績效、縮控成本、追求錢的最大價值）；這些都讓實務性研究焦點大幅轉向。導致後來的研究，雖然蒐集很多基礎資料，但很少關注服務干預的成效；個案的故事少了，社工服務者的聲音不見了，長期追蹤研究減少了，深度且具個案參與機會的研究消失了，社會工作研究之多樣性不再。對機構組織來說，短期內可以完成、發表、爭取到經費、輕薄短小的方案評估，就是「好」研究（引自Gibbs, 2001）。在這樣的情境下，社會工作研究社群可能會忽略了研究實務的真正目標，是創造更好的實務干預：找出導致「問題行為」的結構性因素；是探究導致不平等與不正義的環境因素；或質疑「為什麼個案的問題會

被視為是問題？」的標籤化過程（Webb, 2001；引自Humphries, 2008）。

「知識本質是甚麼？」「哪種研究才叫研究？」「研究服務了誰的利益？」「誰來決定甚麼是好的方法與資料？」「發表出來的知識是否有多元的聲音？」「有沒有所謂的多數或主流觀點，卻壓迫了少數者的聲音？」「知識的生產本身是否也複製了權力與階層？」等議題。科學研究不應只是符合管理階層的需求，更應該注重的是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使命；做研究是為了揭露不平等和不正義，是為了弱勢者聲音得以被公平地聽見。若我們排除了對問題的結構性因素探討，如性別、族群、種族性的壓迫等，當我們不再傾聽個案的聲音，當社工的經驗不被重視，當生態與系統取向的參與消失、當批判與行動導向的設計不受青睞；最後社會工作產製出的知識，還是些個人導向的問題解決（短期焦點解決模式）；或少數的後現代囑語：試圖解構二元對立的反主流論述。

近年來歐美社工學者嘗試以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Craig & Bigby, 2015; Fletcher, 2017; Houston, 2001, 2010; Oliver, 2012）為社工典範之應用、也有主張服膺於實用主義（Hothershall, 2018）典範，限於篇幅，本文無法細述社會工作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各種爭辯，但或許我們可以開始反思並對話？這也是本文標題「為何而研究」的出發點。或許，不同社

會工作服務領域，也可以發展其不同的典範信念。例如，醫療與照顧服務領域或許偏向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但婦幼保護、貧窮救助、青少年發展，則應傾向更多充權、解放性觀點？當我們從事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工作、原住民族權益保障，發起社會倡議運動，或許就該以參與式典範為宗？身心障礙者因不同障別和程度，而需求不同性質的服務和權益保障，批判實在論、參與式觀點，或都可助其發聲？遭遇歧視的LGBTQ族群或新住民婦女，或許女性主義可以在此成為社工服務的本體論選擇？

## 參、方法論：不同典範下的研究倫理議題

Guillemin與Gillam（2004）指出，研究倫理包含三個次類型：（一）程序性倫理（procedural ethics）：在相關倫理委員會的認可下執行研究；（二）操作性倫理（ethics in practice）：在研究過程中每天會遭遇到的倫理議題；（三）研究倫理（research ethics）：能與專業倫理守則相互鏈接的研究（引自Sobočan et al., 2019）。更具體而言，有倫理的研究不僅是程序上的正義，更需要關注研究與專業倫理是否相互鏈接？因為社會工作主要的研究對象和問題脈絡，仍是多屬於弱勢或不利處境者；故理想上，研究倫理應涵蓋

整個研究過程。

實證主義科學觀，較關注「以人類為受試者」（如：生物醫學、心理學等）的研究，多以「價值中立」、「保持客觀」、「知情同意／自願」、「保護隱私」等「程序性」守則作為研究操作的基本要求。對於如何真正落實「尊重和無傷害」、「評估風險與利益比」、「真實性與有效性」、「讓受試／參與者公平分享成果」等「實質性」倫理原則，則較少被要求（Guillemin & Gillam, 2004; 引自 Sobočan et al., 2019）。

蔡甫昌等人（2008）對研究倫理的發展歷史、原則、與實施準則，做了詳細的介紹，但主要還是以實證主義的倫理準則為主。該文提出許多程序性的倫理原則；例如，追溯到1767年英國Slater V. Baker與Stapleton（外科醫師因病患骨折癒合不好，將其骨頭打斷再以金屬矯正器重新矯正，卻因未先經過病患同意而被判有罪）一案，而讓「知情同意」的概念首度成為普遍的規範。Reed（1901; 引自蔡甫昌等，2008）提出的五項道德要素（委員會成員親自參與實驗、簽署同意書、付款給受試者、受試者不包含兒童、報告發表應標示取得受試者充分同意）等。也介紹了「紐倫堡守則（the Nuremberg Code）」（1947）、「赫爾辛基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1964）、1974年美國通過《國家研究法》（*National*

*Research Act of 1974*）、1979年「貝爾蒙原則（the Belmont Principles）等內涵；特別是針對孕婦、活體胎兒、受刑人、兒童、心智障礙者等對象進行的人體研究，須加以嚴格的審查等倫理規範。

蔡甫昌等人（2008）也說明了其中的三項基本倫理原則：尊重人格（respect for person），包含尊重有自主性個人的自主性、保護自主性較低的個人，並透過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原則，做到完整資訊（information）、充分理解（comprehension）、自願參與（voluntariness）的程度；也討論了不同生命倫理學者對所謂「尊重人格」的討論和詮釋。例如，不應單純地僅由「自主」來定義「人」，也不應將「自主」簡化為「自我決定」、「自由」、「選擇」等重點；而應考慮到如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人」的意義重點，在於關係性（relationality）、連結（connection）、承諾（commitment）等。此種將倫理原則拉高至哲學、本體論層次的思考，對於把「尊重案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奉為金科玉律的社工研究者來說，值得參考。

知情同意、不欺騙、預防心理或身體傷害、隱私、保密以及收集和提供準確調查結果的承諾，諸如自治、善行和正義等原則（如：Banks, 1995; Gray, 2008; Panter & Sterba, 2011; Peled & Leichentritt, 2002;

引自Sobočan et al., 2019），大概都是研究者基本要遵守的程序性倫理守則，也可透過相關倫理審查機制進行把關。多數程序性倫理原則只關注避免欺詐或保護人類受試者；對於研究的本質、不同典範間的倫理要求差異，一般的教科書多不會談及。特別是當社會工作研究場域中，多以相較弱勢的個案為研究對象，或相較於學術工作者較無權力的實務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當社工人員研究受暴婦女、身心障礙者、兒童和青少年；社工界教師又以社工人員和其實務操作場域為研究對象，研究

他們的價值、態度、專業技術等；大量的碩博研究生，為了撰寫學位論文，以各種服務人口群、工作者及其組織環境為研究對象。除了研究法教科書上的程序性倫理原則外，我們是否應更關注實質性的、甚至是價值性的倫理原則？

表2是作者依據Lincoln等人2011年版本，並參考整合之前版本文字擇要翻譯不同典範爭議下，與研究倫理相關的重要議題。搭配表1，或許可以更詳細地理解在不同的科學典範下，不僅社會工作研究的專業定位與價值立場思考不同，連資料來

表 2 五種典範之研究倫理議題比較

重要的倫理議題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研究價值（最重要的研究產品為何？）	以科學性的嚴謹程度為黃金標準，符合標準程序的研究方法就是最重要的價值產出。	即便資料不夠完美或可能包含隱藏性價值，但仍能找到有用的資訊。	研究資料能修復社會正義，帶來轉型功能，就是有用的資料；能帶來理性的反思和實務運作上的改變；能給出理性的自我察覺、集體的自主性、快樂、正義、身體愉悅、玩樂、愛、具美感的自我表達等等，就是價值。	人們彼此關聯並被理解；過程和結果不應分開；價值被含括、形成於研究資料中。	

重要的倫理議題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倫理（雙方的關係，對研究對象產生的影響）	研究資料主導一切，不應發生任何副作用；研究焦點是自然，不是被自然影響的人。	應盡可能如統計數字般地精準地詮釋實體。盡可能排除各種效應，因為研究的目的是獲得正確性知識，不是去影響人們。	法蘭克福學派思想：研究應與發展公義社會的目標緊密連結。	本質性的：於過程中關注啓發（revelation）；揭露與反思應包含在研究的所有面向，文化檢視的過程之中。	
研究者姿態	無私的科學家：提供資訊給決策者、政策制定者和變革者。		促進轉型的知識分子：行動者與倡議者。	熱情的參與者：讓多重聲音得以交流並重構的促進者。	研究的首要發聲應來自於對行動進行自我反思之覺照；次要發聲來自於對各種理論、敘說、行動、歌曲、舞蹈等再現形式之釐清。
效度的意義	效度存在於「黃金標準」（gold-standard）資料，而這些資料是可以被證實、重複測量（複製研究）的。	效度存在於可以透過統計檢定和分析的資料中，雖然這些資料僅能大致的接近真實。	效度存在於參與式或行動研究中創造出來的「行動」；這些行動應具有帶動正面社會變遷、解放性社區行動之動能。	效度來自於共識的延展與建構。效度存在於所有資料中。因為在相互建構過程中，某些資料對A可能沒有意義但對B來說卻是真實的核心基礎。換言之，只要人們能從中找到其對真實實體的反思與詮釋，那所有的資料就都是有效度的。	效度來自於共識的延展與建構。效度存在於知識能帶動多少社會轉型之能力，而這些知識應來自於主體經驗之發現。

重要的倫理議題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好研究的品質指標	知識是透過推論與因果律則之建立與累積的。 好的研究應先具有科學性的資料品質。嚴謹性（rigor）的常規基準檢驗：如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客觀性等。	應重視研究資料的統計信賴水準和客觀性。	透過結構的與歷史的洞察，展現出歷史的情境性（historical situatedness）；能消除無知與誤解；能激發改變的行動。	信實度（trustworthiness）與真實性（authenticity），包含能催化出行動。前者包含確實性、轉移性、可靠性、確認性四個指標；後者包含本體的真實性、教育的真實性、觸媒的真實性、策略的真實性等四個指標。	好的研究應就前述的經驗性、表達性、命題性、實作性知識層次上取得一致性與整合性理解，並能引導參與者採取積極行動以轉化世界、促進人類的興盛。
訓練研究者	技術性與量化方法；發展真實存在的理論。	技術性、量化和質化方法兼具；發展真實存在的理論。	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的過程：量化與質化方法兼具；學習歷史的解析辯證能力；訓練研究者具備利他與充權的價值態度。	促進者（原研究者角色）應具備好的情緒能力、擁有具民主／政治的（democratic）的人格特質和技巧，並應訓練參與研究的相關人員具備積極的過程參與能力。	
行動	研究之後，研究者仍然與研究客體保持距離，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研究的價值與目的就是去引發社會變革，改變人們的想法，以利檢視人類的真實存在（existence）。	如果沒有參與者，建構主義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因此研究者和其參與研究者，應正確地理解他們所處的社會脈絡，並正確地反思資料在其脈絡中所呈現的真實意義。因此，行動與研究的有效性是相互影響的。	

重要的倫理議題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聲音、反身性、後現代文本再現	只有研究者能發言；任何帶入研究參與者聲音的行為都將影響客觀性。讓資料數據自己說話，能重複測量而得的資料一致性，將能證明研究者的客觀。		研究者能發言，但也賦予參與者發言機會。研究者透過自己的典範立場去展現知識時，也應對他人的觀點保持敏感度。	應以研究者與參與者相互混合的話語為主流發言；鄭重地進行反身性對話以提問；關注文本的再現問題。反思的議題可以包含：混合研究設計、評估研究品質、研究者與理論和哲學的關係、與參與者、公共大眾的關係等。	混合的聲音：文本再現很少被討論，卻常常是有問題的；反身性要仰賴批判的主觀性和自我察覺。文本的運用必須回到研究場域脈絡中，主體的聲音必須在研究中被呈現出來。
資料單位之相容性	共量性：研究變量和分析單位必須是相同的；實證主義典範下的所有資料形式都是可以相容且具等同性的。		非共量性：所蒐集的資料不必然要具相同的測量變量；不同研究取向與不同方法的資料都可以成為資料來源。但因研究的目的是要引領社會轉型，所以依批判理論取向取得的資料，應該優先被看重和採納。	非共量性：與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典範具不可共量性。但與建構主義、參與式主義和批判性理論觀點則可共量。不同研究取向與不同方法的資料都可以成為資料來源。資料單位不必然要具相同的測量變量；特別是在文化檢視方向。	非共量性：與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典範具不可共量性。但與建構主義、參與式主義和批判性理論觀點則可部分相容，特別是在文化檢視方向。

重要的倫理議題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參與式典範 Participatory
控制	研究者對研究的程序和結果，有絕對的控制權力。		特別是女性主義和種族研究，研究的成果應用是研究者與研究主體（對象）共同分享的，他們也應可以對研究的設計與執行表達其意見。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享對研究的控制；若沒有平等或平等合作的關係，研究不應被進行。	知識就是一種權力的表達。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享對研究的控制；若沒有平等或平等合作的關係，研究不應被進行。

資料來源：作者摘錄、綜合整理自Lincoln等人（2011, pp. 98-105, 111-112）。

源、資料品質、「好研究」的標準等，也都有不同的定義。

舉凡從研究設計（選擇主題、提出問題意識、反思與澄清假設、社會價值確認等）、研究執行（合作關係、對象選取與邀請、資料蒐集方法、資料保存、資料分析、資料檢核、真實性與有效性等）到成果發表（研究貢獻確認、發表形式、獨立審查與回應、社群關係與政治權力風險等）各階段，均仰賴研究者與其學術／實務社群，持續不斷地、審慎而熱情地進行反思與辯證，以期能在社會變遷中，讓知識創造成為一種能引領學術發展或專業創新的力量。

作為研究人員，我為何要選擇這個特定的研究問題？什麼是相關的或什麼叫做研究？哪些資料或訊息是具有正當性的？哪些研究方法是可接受的，以及誰有權力

來決定？研究資源要如何取得和分配？這項研究真正利益了誰或甚麼？（Canella & Lincoln, 2007；引自Sobočan et al., 2019, p. 806）

英國社會工作者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BASW）倫理準則規定：

社會工作研究之目的和過程，包括方法論的選擇和研究結果之應用，應與尊重人性尊嚴和價值、實踐社會正義的承諾相符。（BASW, 2002, p. 14；引自Sobočan et al., 2019）。

換言之，社會工作研究者，應確認研究之目的是為了增強服務使用者的能力，提升其福祉、強化其獲得經濟與社會資源的機會。應積極與弱勢的群體、個人和社區合作，從尊重基本人權、實現社會正義的基礎上，來設計、闡明和達



成研究（Humphries, 2008; Sobočan et al., 2019）。Gary Craig（2002）認為符合正義原則的研究倫理應關注，證據、聲音、參與三個面向；Fiona Williams（2000）從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分析者角度指出，有倫理的研究應包括下列要素：相互依賴、關懷、親密性、身體尊嚴、認同、聲音等；而這些都是非程序性、也非實質性，而偏向價值性的倫理原則（引自Humphries, 2008）。例如，社會工作者因與服務使用者互動緊密，是最有資格在證據判讀和知識累積上貢獻真實的、系統性的觀點，特別是指出現存不正義之所在。為弱勢者發聲、在關係中建立相互依賴性、親密性，相互認同、關懷，則是女性主義倫理的核心。惟檢視2021年新版的BASW倫理守則，已經不再對研究有那麼清楚的定義；顯示新管理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影響深遠。

Jo Campling（1992）指出，社會工作的研究態度應該擴充到倫理和正義的面向，並符應三個原則：第一，相對於社會控制模式，社會工作應採取參與式／發展性的模式；第二，反壓迫的價值；第三，在實務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間應致力建立一種「真正」的夥伴關係。因此，在研究上，應盡量以全人的（holistic）觀點來形成研究問題（意識），且不應將資料蒐集、資料分析、評估視為線性的、獨立的工作片段；而是應於每個研究步驟中，

反覆地、持續地思考有關價值、目的、倫理、溝通、角色與技巧等議題；並將反壓迫與發展性社會工作的原則，貫穿於整個研究當中。換言之，社會工作研究不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假設驗證，而是一種批判反思的行動參與（引自Humphries, 2008）。

## 肆、為何而研究？研究方法如何反應專業的價值？

實在論、批判論、批判實在論、行動參與典範、甚至實用主義論，各有擁護者。Smith（1987）曾指出實證主義在社會工作研究中是有侷限性的；Houston（2001, 2005）也認為實證主義、建構主義都有其不足，故嘗試發展批判實在論在社工實務的運用。目前北美的社工學界似乎較傾向選擇以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為本體典範（Fletcher, 2017）；而歐洲的典範論述則較多元，沒有那麼實證取向。很明顯地，實證主義缺乏表二中其他研究典範所肯定的知識來源；包含經驗性（Edwards & Daniels, 2012; Orlikowski, 2006; 引自Hothershall, 2018, p. 2）、默認的（Kothari et al., 2012）、常識性的（Lundestad, 2008; 引自Hothershall, 2018, p. 2）、脈絡性的（Gibbons, 2000）知識來源。當實證主義處於某種霸權地位時，社會建構論、現象學、詮釋學、後結構主義、符號互動論

等，都將被邊緣化。因此，Hothershall主張的是參考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為典範，也無須爭論甚麼才是社會工作的正確本體論或認識論典範；只要足以撐出一個開放的空間，讓各種從不同方法蒐集來的、各種類型的知識、多元的聲音和理解都能共存就好。也就是說，研究應該關注於對人類情境「甚麼是重要的」（what matters），而不是去爭議「甚麼是有效的」（what works）。

Bentley等人（2019, p. 434）也建議，社會工作研究法教學設計應反映出社會正義、人權、多元性的主題，包括：

- （一）明確地定義社會正義、人權、多元性是社會工作的科學的一部分；
- （二）採取社會正義取向的研究典範和相關理論；
- （三）教導學生了解，為什麼需要將社會正義、人權和多元性等概念融入到研究中；
- （四）執行社會正義導向研究的最佳操作和創新模式，並貫穿於研究問題之選擇與概念化、發展具體問題與研究設計、抽／選樣、同意、招募與激勵研究參與者、設計並選擇測量工具或策略等操作過程；
- （五）詮釋與反思研究發現，規劃如

何發表與後續的行動。這些提醒也回應了表2中的各種倫理性議題，可為參考。

作者認為，實務者無須被迫在典範爭議中選擇單一本體立場，但卻不應自外於這些討論之中。因為如果只為爭取資源而研究、因研究而想獲得更多資源，極可能會失去對專業價值之堅守。社會工作的知識生產，如何在不同典範與實務需求間取得平衡？如何發展真正回應社會工作原則，如正義、平等、充權、自決、合作、反排除、社會改革等原則的研究取徑？如何在不同的知識典範爭議中，致力於整合研究構想和行動？作為教育者，研究法教學，該如何與實務行動取得更多合作？如果學生只是從課堂中學習到過去的知識，而非學習到思考與行動，我們如何期待未來的社工能對應變化莫測的社會環境？最終，這些都將回歸到社會工作社群的反身性（reflexivity）能力，也是社會工作專業社群應持續省思的議題。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研究典範、社會工作知識論、研究倫理、參與式行動

## 參考文獻

張英陣（2006）。〈Mind the Gap：研究與實務的整合〉。《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0（2），87-116。https://doi.org/10.6785/SPSW.200612.0087

- 蔡甫昌、林芝宇、張至寧（2008）。〈研究倫理的歷史、原則與準則〉。《台灣醫學》，12（1），107-122。https://doi.org/10.6320/FJM.2008.12(1).12
- Anastas, J. W. (2014). The science of social work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4(5), 571-580. https://doi.org/10.1177/104973151351133
- Andersen, M. L. (2019) Empowering collaboration within a Danish workfare paradigm: A challenge in social-work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2(5), 778-790. https://doi.org/10.1080/13691457.2018.1553149
- Aymer, C., & Okitikpi, T. (2000).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What's that got to do with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1), 67-75. https://doi.org/10.1080/026154700114667
- Bailey, R., & Brake, M. (Eds.). (1975). *Radical Social Work*. Edward Arnold.
- Bentley, K. J., Mancini, M., Jacob, A., & McLeod, D. A. (2019). Teaching social work research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d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55(3), 433-448. https://doi.org/10.1080/10437797.2018.1548985
- Clarke, J., Cochrane, A., & McLaughlin, E. (1994). *Managing social policy*. Sage.
- Craig, D., & Bigby, C. (2015). Critical realism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Examining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ustralian Social Work*, 68(3), 309-323. https://doi.org/10.1080/0312407X.2015.1024268
- Edwards, A., & Daniels, H. (2012). The knowledge that matters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25(1), 39-58. https://doi.org/10.1080/13639080.2012.644904
- Engen, M., Nissen, M. A., & Uggerhøj, L. (2019). Challenges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 Conflicts, barriers and possibilities in relation to social 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2(5), 735-737. https://doi.org/10.1080/13691457.2019.1640004
- Ferguson, I. (2008). *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Sage.
- Ferguson, I. (2009). 'Another social work is possible!' Reclaiming the radical tradition. In V. Leskošek (Ed.),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work: Explor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p. 81-98).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 Ferguson, I., & Woodward, R. (2009). *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 Making a difference*. Policy Press.
- Fischer, J. (1973). Is casework effective? A review. *Social Work*, 18(1), 5-20. https://doi.org/10.1093/sw/18.1.5
- Fletcher, A. J. (2017). Applying critical realism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meets method.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2), 181-194. <https://doi.org/10.1080/13645579.2016.1144401>
- Forte, J. A. (2014). *Skills for using theory in social work: 32 lessons for 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 Routledge.
- Germain, C. B. (1973).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casework practice. *Social Casework*, 54(6), 323-330. <https://doi.org/10.1177/104438947305400601>
- Gibbons, M. (2000). Context-sensitive science: Mode 2 society and the emergence of context-sensitive scien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7(3), 159-163. <https://doi.org/10.3152/147154300781782011>
- Gibbs, A. (2001). The changing nature and context of social work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1(5), 687-704. <https://doi.org/10.1093/bjsw/31.5.687>
- Gringeri, C., Barusch, A., & Cambron, C. (2013). Epistemology in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research: A review of published articles, 2008–2010. *Social Work Research*, 37(1), 55-63. <https://doi.org/10.1093/swr/svs032>
-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7). Sage.
- Guba, E. G. (1990). The alternative paradigm dialog. In E. G.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17-30). Sage.
-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1). *Effective evaluation: Improving the usefulness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rough responsive and naturalistic approaches*. Jossey-Bass.
-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2).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es of naturalistic inquir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0, 233-252. <https://doi.org/10.1007/BF02765185>
-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Sage.
- Hothersall, S. J. (2018/2019). Epistemology and social work: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through philosophical pragmat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2(5), 860-870. <https://doi.org/10.1080/13691457.2018.1499613>
- Houston, S. (2001). Beyo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Critical realism and social wor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1(6), 845-861. <https://doi.org/10.1093/bjsw/31.6.845>
- Houston, S. (2005). Philosophy, theory and method in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empiricism's claim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5(1), 7-20. <https://doi.org/10.1177/1468017305051242>
- Houston, S. (2010). Prising open the black box: Critical realism, action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9(1), 73-91. <https://doi.org/10.1177/1473325009355622>

- Humphries, B. (2008). *Social work research for social justice*. Palgrave Macmillan.
- James, S., Lampe, L., Behnken, S., & Schulz, D. (2019).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knowledge utilisation - A study of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among social workers in German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2(5), 763-777. <https://doi.org/10.1080/13691457.2018.1469475>
- Kothari, A., Rudman, D., Dobbins, M., Rouse, M., Sibbald, S., & Edwards, N. (2012). The use of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in public health: A qualitative study. *Implementation Science*, 7(20), 1-12. <https://doi.org/10.1186/1748-5908-7-20>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Sage.
- Lincoln, Y. S., & Guba, E. G. (2000).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1065-1122). Sage.
- Lincoln, Y. S., Lynham, S. A., & Guba, E. G. (2011).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97-128). Sage.
- Lincoln, Y. S., Lynham, S. A., & Guba, E. G. (2017). Paradigmatic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 revisited.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5th ed.; pp. 163-188). SAGE.
- Longhofer, J., & Floersch, J. (2012). The coming crisis in social work: Some thoughts on social work and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2(5), 499-519. <https://doi.org/10.1177/1049731512445>
- Longhofer, J., & Floersch, J. (2014). Values in a science of social work: Values-informed research and research-informed values.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4(5), 527-534. <https://doi.org/10.1177/1049731513511119>
- Melnik, B. M., & Newhouse, R. (2014). Evidence-based practice versus 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 *Worldviews on Evidence-Based Nursing*, 11, 347-349.
- Oliver, C. (2012). Critical realist grounded theory: A new approach for social work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2(2), 371-387. <https://doi.org/10.1093/bjsw/bcr064>
- Pinkney, S. (1998). The reshaping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care. In G. Hughes & G. Lewis (Eds.), *Unsettling welfa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policy* (pp. 251-290). Routledge.
- Roberts, A. R., Yeager, K., & Regehr, C. (2006). Bridging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ork. In A. R. Roberts & K. Yeager (Eds.), *Foundations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 (pp. 3-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ckett, D. L., Rosenberg, W. M., Gray, J. A., Haynes, R. B., & Richardson, W. S. (1996). Evidence-based

medicin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2(7023), 71-72. <https://doi.org/10.1136/bmj.312.7023.71>

Serbati, S., Moe, A., Harold, G., & Halton, C. (2019). Pathways for practitioners' participation in creating the practice-research encounte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2(5), 791-804. <https://doi.org/10.1080/13691457.2019.1582008>

Smith, D. (1987). On the limits of positivism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7(4), 401-416. <https://doi.org/10.1093/oxfordjournals.bjsw.a055355>

Sobočan, A. M., Bertotti, T., & Strom-Gottfried, K. (2019).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2(5), 805-818. <https://doi.org/10.1080/13691457.2018.1544117>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02). *Code of ethics*. <https://www.basw.co.uk/about-basw/code-ethics>